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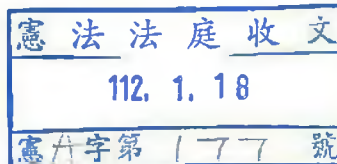


聲請解釋憲法理由補充 ✓		狀
判決書案號	109 年度 憲二字第 355 號	承辦股別
訴訟標的 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 元	
稱謂	姓名或名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所、就業處所、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郵遞區號、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位址、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聲請人 	劉雲憲	身分證字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為補充聲請解釋憲法理由事

茲聲請人梁雲因聲請解釋憲法，經鈞院以107年度憲二字第355號併案107年度憲二字第331號併案在案，今再具狀補充聲請解釋憲法理由，茲說明如下：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部分，於犯罪情節輕微，顯可憫恕之情況下，法院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最低刑度仍達有期徒刑15年，尚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可能構成顯然過苛之刑度，於此範圍內，確信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所益之憲制，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不符，有違反憲法第22條之比例原則，顯然影响判決之結果，故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鈞院解釋，求為宣告前開法律與憲法意旨不符之部分無效。

貳、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憲法條文

一、臺北市刑事警察大隊於民國96年偵辦陳五豐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案件時，由通訊監察譯文中得知陳五豐委由聲請人劉豐藩（下同）交付海洛因毒品1仟元於購毒者王清萱，案經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改制前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以97年度偵字第26299號起訴，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處以有期徒刑15年6月（98年度訴字第430號），及沒收追徵犯罪所用手機並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1仟元。經聲請人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361號判決，認聲請人與陳五豐共同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2月，及沒收追徵犯罪所用手機並犯罪所得新臺幣1仟元，案件就此確定。（上訴最高法院駁回）

二、檢察官起訴書及第一審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已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均為聲請人與陳五豐基於共同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包予王清萱；原確定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361號）認定之犯罪事實為王清萱向陳五豐電話預約購買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仟元，陳五豐委由聲請人交付，並收取價金1仟元而完成交易。聲

請人否認犯行，原確定判決認聲請人犯罪事證明確，又認聲請人與陳五豐共同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對象僅1人，金額為新臺幣1仟元，屬零星交易，與大毒梟之惡行有別，倘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嫌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因而認聲請人犯罪情狀顯堪憫恕，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聲請人刑度，並先加後減之；聲請人否認犯行，故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減刑規定之適用，因而量處聲請人有期徒刑15年2月，並諭知沒收返徵。本案除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聲請人刑度，別無再減輕聲請人刑度之空間，而依刑法第64條第2項規定，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同法第65條第2項規定，無期徒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有期徒刑。亦即，本案聲請人依通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最低刑度仍達有期徒刑15年。

三、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8條固有明文。人身自由乃憲法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立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以刑罰限制人身自由，雖非憲法所不許，惟因刑罰乃不得已之強制措施，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應受到嚴格之限制（釋字第646號、第669號、第775號、第790號解釋參照），尤其法

死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時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稱，始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所違（釋字第546號、第551號、第646號、第669號、第775號、第777號、第790號解釋參照）。本件釋憲聲請求解者，仍爭規定之法定死刑、無期徒刑部分，於犯罪情狀輕微，顯堪憫恕而適用刑法第59條之情況下，是否仍導致刑罰與罪責顯不相當，使人民之人身自由顯可能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抵觸憲法第8條、第23條之規定。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所持立場與見解

一、懇請大法官再次審查爭規定不分情節輕重，概予死刑、無期徒刑之合憲性

(一) 鈞院於88年1月29日釋字第246號解釋，就爭規定法定死刑、無期徒刑是否違憲部分，解釋文認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立法目的，係「特別為肅清煙毒、防制毒品危害、藉以維護國民身心健康，進而維持社會秩序，俾免國家安全之陷於危險。因是拔其貽毒之本，首予杜絕流入之途，即著重煙毒來源之截堵，以求禍害之根絕；而製造、運輸、販賣之行為乃煙毒禍害之源，其源不斷，則流毒所及，非僅

多數人之生命、身體及其侵害，并社會、國家之法益亦不能免，為害之鉅，當非個人一己之生命、身體法益所可比擬。對於此等行為之以特別立法嚴厲規範，當已符合比例原則；抑且製造、運輸、販賣煙毒之行為，除有上述高度不法之內涵外，更具有暴利之特質，利之所在，不免群趨僥倖，若僅藉由長期自由刑措置，而欲達成肅清、防制之目的，非但成效難期，要亦有悖於公平與正義。」解釋理由中並謂「憲法第8條、第15條固明定人民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惟國家刑罰權之實現，立法機關本於一定目的，對於特定事項而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以別普通刑法於犯罪及刑罰為一般性規定者，倘該目的就歷史淵源、文化背景、社會現況予以觀察，倘無違於國民之期待，且與國民法的感情亦相契合，自難謂非屬正當；而其為此所採之手段，即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為必要之限制，乃補偏救弊所需，亦理所當然者，即應認係符合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至於其依循上述目的與手段間之均衡，就此等特定犯罪之評價所為之法定刑規定，在法益保護之考量上，普通刑法之其他犯罪與之並不相侔者，尤不得單以個人之價值判斷，執以否定立法之價值體系，而以其間

乎人民生命、身體自由之乙端，即謂係有違於前開憲法規
定之保護意旨。」且就「81年7月27日修正公布之『肅清煙毒條
例』、87年5月20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係鑒於
煙毒之禍害蔓延，跨國販賣活動頻繁，而對之有所因應。故
其立法目的在防止來自世界各國毒害，查緝流入毒品，預防及
制裁與毒品有關之犯罪，亦即肅清煙毒，防止毒品危害，藉以維
護國民身心健康，進而維持社會秩序，俾免國家名全之陷於
危殆。因是拔其貽害之本，首予杜絕煙毒流入之途，即重煙
毒來源之截堵，俾能清其源而遏其流，以求根絕。茲製
造、運輸、販賣乃煙毒之禍源，若任令因循贖顧，則吸食
者日眾，漸染日深，流毒所及，非僅多數人之身體法益受其
侵害，并社會國家之法益亦不能免，此殷鑒非遠。是對於此
等特定之行為嚴予非難，並特別立法加重其刑責，自係本於現
實之考量，其僅以兩不相侔之侵害個人法益之殺人罪相比擬，
殊屬不倫；抑且製造、運輸、販賣煙毒之行為，除具備前述
高度不法內涵外，更具有暴利之特質，利之所在，不免群趨僥
倖，倘僅藉由長期自由刑之措置，欲達成肅清防制之目的，非
但成效難期，要亦有悖於公平正義。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

第一項：『販賣、運輸、製造毒品、鴉片或菸煙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其中關於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法定刑規定，係本於特別法嚴禁毒害之目的而為之處罰，乃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亦違憲法第23條之規定，與憲法第15條亦無抵觸。」

(二)然而，誠如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669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所言，當立法者於普通刑法原有評價體系上，另外以特別法加重刑度時，基於其性質上是嚴峻的例外立法，特別容易產生違反體系之價值判斷，此種例外的特別立法本應有非常堅強的正當理由始得為之。特別刑法本應屬極端例外，但我國卻歷經長達半世紀的非常法制，以及對亂世重要的普遍迷信，而有為數眾多的特別刑法，嚴重破壞刑法體系。審查標準的擇定，部分亦是歷史經驗的產物以及對當代課題的回應，而致使立法者檢討特別刑法重刑林立的現象，使國家刑罰權回歸到最後手段性的原則之內，堪稱是大法官的時代任務，是以司法者至少在針對特別刑法重刑規定進行違憲審查的有限範圍

內，應對相關立法事實採取嚴格審查，要求立法者針對據以制定特別刑法重刑規定之相關立法事實，應作具體而詳盡的深入分析，倘司法院無法確信立法者的判斷是正確的，舉證的不利應由立法者負擔。

(三)再就立法事實而言，釋字第476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已為本案規定之立法事實提出了綿密的說明，敘明如前，可知該解釋之所以認定本案規定為死刑、無期徒刑合憲性之案件類型，係固著於「防止來自世界各國毒害」、「拔其貽害之本，首予杜絕煙毒流入之途」、「毒源不斷」、「流毒所及」、「多數人之生命、身體受其侵害」、「社會、國家之公益亦不能免」、「具有暴利之特質」等國內外大型毒梟之製造、運輸與販賣之具有高度不法內涵之犯罪型態，然此實與本案聲請人與毒友間偶發之零星、微量、僅1仟元價金之交易型態明顯有別，差異甚大。釋字第476號解釋雖未針對後者即本案交易型態之不法內涵做出合乎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比例原則與否之解釋，故實有另行解釋之必要。

二、相對均衡之檢驗

(一)依嚴格審查標準之內涵，應檢驗本案規定是否滿足相對

刑權及絕對均衡之要求，即就基準規定之懲罰，與普通刑法之犯罪類別做出體系性的比較，據以判斷是否合比例性。因現實上立法者傾向制定特別刑法而非修訂刑法，通常正是因為刑法典修訂不易，且對特定罪名的極端重刑主義在刑法中難以立足，欲圖方便所致；這更顯出刑法典修改通常需要較體系性的考量、較審慎的立法審議過程、較冗長的民主歷程，是以當立法者選擇採取特別刑法規避這些「困擾」時，司法審查對之嚴格審查，係為補足在特別的立法程序中通常容易被模糊掉的體系性思考，與錯失的民主審議。釋字第476號解釋曾處理到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的刑度能不能相比的問題，其指出「豈不得僅以關乎人民生命、身體之自由，遂執兩不相侔之普通刑法規定事項，而謂其係有違於前開憲法之旨。」似乎暗示特別刑法既曰「特別」，便不能與普通刑法之價值判斷相較，又其理由書亦有謂保護法益不同，不得用以比較刑度輕重輕重等等。但刑罰規定固不必要也不可能強求規定在同一部刑法典中，然而無論散見何處、性質上是否為特別刑法，刑罰體系的價值判斷應該是一個整體，沒有理由僅因基準規定對於他法之中，

或僅因立法者宣稱其為特別刑法，在價值判斷上便可以與整體刑法切割開來。更重要的是，特別刑法的特別之名，絕非得以「特別」之名作為違憲審查的免死金牌，反因其例外法制的地位、因其適用範圍的特殊性與加重刑度，而具有更高的違憲嫌疑，必須嚴格審查（例如：因違憲而失其法律效力的檢肅流氓條例者是）。故上述釋字第476號解釋文字，應理解為特別刑法在整體刑法體系（尤其是普通刑法）的價值判斷比較後，不當然因其刑度在體系性的比較中屬於較重的處罰即違憲，而是尚應考量其他因素綜合評斷，例如所謂刑度較重是重到何種程度？法官在個案中丈量刑裁量空間如何？甚至搭配執行層面的假釋制度等等（以上參釋字第669號解釋評析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二)就系爭規定相同犯行為態樣之法定刑比較方面，81年7月7日修正，同年7月27日公布之肅清煙毒條例（下稱舊法）第5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謂：「對於販賣、運輸、製造毒品、鴉片及意圖製造鴉片而栽種罌粟者，其刑度均為唯一死刑，與刑法修正草案第256條、第257條規定，對製造、販賣、運輸鴉片、毒品等行為，分別處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之

刑度尚非相當。最期刑度之均衡，及考量特別法嚴禁毒害之宗旨，將唯一死刑之刑度均修正為「死刑或無期徒刑」。

亦即，立法者於修法時，亦將特別刑法與普通刑法之法定刑做出刑罰體系之比較。然而，刑法第256條第2項規定：「製造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他合質料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同法第257條第2項則規定：「販賣或運輸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他合質料者，處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較之參照規定法定刑之死刑、無期徒刑，可知參照規定之法定刑係沿襲肅清煙毒條例舊法之規定，而不分毒害情節輕重，概以嚴禁為目的，將刑法第257條第2項、第256條第2項有期徒刑之刑罰級距完全拿掉，直接躍升法定刑至死刑、無期徒刑，却無視刑法第33條第3款規定「有期徒刑：2月以上15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2月未滿，或加至20年。」之規定，視刑罰體系價值之均衡性來看，參照規定之目的與手段之間，已令人高度懷疑不能滿足其合比例性。

(三)就參照規定相同保護法益法定刑之比較法面，釋字第

476號解釋所持參照規定之保護法益，其首要在於「維護國民身心健康」，其次為「維持社會秩序」，再次為「俾免國家安全陷於危險」。而在「維護國民身心健康」之保護法益方面，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其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及健康部分，第1項規定：「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規定：「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78條第1項規定：「使人重傷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項規定：「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亦即，於殺人發生死亡之實害結果者，刑法仍保留有期徒刑之制度，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未發生死亡之結果者，則無死刑或無期徒刑。參照規定之立法事實顯然不生死亡結果之想像，至多僅有死亡之抽象危險，法定刑卻只有死刑、無期徒刑2種制度，而無有期徒刑之制度。兩相比較，其輕重明顯失衡。次就「維持社會秩序」方面，普通刑法法定刑最重者乃刑法第185條之1之規定，其第1項為：「以強暴、脅

通或其他非法方法劫持使用中航空器或控制其飛航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情節輕微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項則規定：「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致重傷者，處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6項規定：「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參照規定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至多僅係上述劫持交通工具罪之預備犯而已，法定刑卻拉高至「死刑、無期徒刑」，全無有期徒刑之立法設計。再於「俾免國家安全陷於危殆」方面，依同樣論理思維，參照規定之行為，至多亦係刑法第101條暴動內亂罪、第103條通謀間戰端罪、第104條通謀喪失領域罪等各罪之預備犯，而暴動內亂罪之預備犯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01條第2項參照），通謀間戰端罪、通謀喪失領域罪兩罪之預備犯，均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03條第3項、第104條第3項參照），參照規定卻是死刑、無期徒刑。以上比較可知，參照規定法定刑之嚴峻而失其合比例之程度更形明確（以上檢廳刑法解釋字第669號解釋詳宋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四）是以，參照規定經刑罰體系之價值比較，不能滿足相對均

衡之罪刑相當原則。對於只有零星販售少量持有之毒品予他人，雖距離單一購毒者因施用毒品而導致健康受損之侵害較近，但其行為，實難評對整個（整體）國民健康有如何之侵害。又行為人侵害較近之原因，與其犯罪動機及其與購毒者之關係等事由息息相關（參後述三（二）之犯罪類型），單憑侵害較近一事，並無法決定其犯罪手段之輕重程度。依此觀之，聲請人認為，販賣行為之「侵害較近」，尚不足以正當化本案規定符合相對均衡檢驗。

三、絕對均衡之檢驗

（一）貴院近來解釋罪刑相當原則已逐漸深化，「絕對均衡」應係合憲與否之主要審查標準，如釋字第669號（空氣槍情節輕微案）、第775號（累犯加重本刑及更改其刑案）、第777號（駕駛人無過失及情節輕微之肇事逃逸案）、第790號（裁種大麻案）等均是。而具體之審查方法，係宣示並一再重申立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以刑罰限制人身自由，雖非憲法所不許，惟因刑罰乃不得已之強制措施，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應受到嚴格之限制（釋字第646號、第669號及第728號解釋參照），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

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稱，始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釋字第544號、第551號、第646號、第669號、第775號及第777號解釋參照）。亦即，犯罪情節及責任之輕重，必須有相稱的法定刑，此為合憲與否的首要檢驗方法。其次，釋字第669號、第775號、第790號均以犯罪情節輕微之程度，必須達到法官得以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的減其刑，而酌減後若仍無法給予被告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宣告刑，則認為處罰規定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違反上述憲法原則；釋字第777號則不待法官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即認情節輕微者無從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刑，處罰顯然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以上第一個檢驗方法即提出絕對均衡之檢驗標準，第二個檢驗方法則係貴院解釋積極回應聲請釋憲者就個案聲請事實之主張，為處罰規定之法定刑訂出合於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之下限。因此，在絕對均衡的檢驗下，必須提出犯罪情節之由最輕到最重之間之各種犯罪型態，再檢視處罰規定的法定刑是否相稱其情節與責任，至於個案犯罪類型之處罰下限應

本為得易科罰金或適用緩刑宣告之刑度，乃個案判斷得出最低刑度之效果，尚非絕對均衡檢驗之重點，故不得謂倘處罰下限經檢驗判斷後未達得易科罰金或適用緩刑宣告刑度，即認處罰規定合於上述憲法原則。

(二)販賣第一級毒品行為之犯罪情節、所生危害及不法程度，其涵蓋之態樣甚廣，小者如為毒販出面遞交價金5百元、1千元之毒品予購毒者之跑腿族（遞交同時或一併收取價金繳回給販毒者），大至如私運毒品數十公斤入境販賣之大毒梟，前者為圖或係由販毒者施捨些許毒品以供施用止癮，後者乃為獲取販毒暴利之毒品分配與價格控制，光譜兩端之間，情節輕微者亦有如本件聲請之毒友間零星偶發型之小額量微之交易。詳言之，依個案販賣毒品之輕重、價金之高低、對象之多寡、販毒者與購毒者之關係、販毒種類是否混雜二種以上毒品、次數是否頻繁或偶發、販毒者係主動兜售或被動售出、是否受人命工參與共犯等情狀，可知個案所呈現之犯罪樣態實有諸多差異，是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罪情節、所生危害與不法程度，樣貌多種，輕重程度明顯有其級距之別。倘以販賣毒品罪所保護法益即整體國民健康、社會秩

序或國家安全之視角觀之，亦足明法益侵害程度之差異性甚廣，實無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兩種法定刑的選擇予以簡單對應或評價，法律規定必然使法院在無法論以死刑或無期徒刑之非重大個案，遭遇找不到相稱刑罰之難題，此於聲請人無同條例第17條第1項（供出來源因而查獲正犯或共犯）、第2項（偵審自白）減免其刑之規定時，更足彰顯之。其結果，法官大量使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的減被告刑度，於某些個案，已被批評為濫用的減規定，侵越立法權限之份際。可以推知法院就個案犯罪情節、危害及不法程度，於找不到相對稱之法定刑，又不願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在別無選擇又必須下判決的情況下，不得已只好勉予適用刑法第59條的減其刑，並諭知宣告刑。此乃法院酌量刑時，陷於維谷，進退兩難，思維已逐漸困頓所致，實無法苛責。故與其爭執個案是否符合刑法第59條要件，不如認法律規定之法定刑實在過重又過於僵化。又毒品案件乃刑事案件之最大宗類型（含觀察勒戒案件、強制戒治案件、審判案件、定應執行刑案件、執行之聲明異議案件、假釋對保護管束案件），刑事法庭法官對毒品案件之犯罪百態，及販毒者、

購毒者互動關係之人生無奈，觀釋與感度當屬廣泛而敏銳，故與其認為法官不食人間煙火、不知國情，毋寧認問題的根源，在於養爭規定之法定刑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之「絕對均衡」，已難以容忍，不得不向貴院求解。

(三)再從比較法之五法例觀釋，德國就販賣毒品之處罰，係依行為人之犯罪動機、毒品數量、獲利多寡、是否實際使他健康受損、是否屬於幫派分子等因素，以不同條項來建構犯罪類型，以之作爲法定刑輕重之依據。此種規範方式直接依行為態樣區分不法程度，並因應不同的不法程度規定不同的法定刑。此與本聲請書（補充理由）前所提到之實務常見的不同交易型態相當，可認為盡量客觀化不同交易型態之犯罪類型，區隔出輕重級距有別之法定刑，滿足了「絕對均衡」之要求，由此可反視出養爭規定之缺陷。又觀日本販賣海洛因行為之處罰，係規範在「麻醉藥品與精神藥物取締法」，設法第64條之2第1項就無故轉讓行為，處10年以下懲役，或依情狀處1年以上有期懲役及1百萬日元以下罰金。日本法的規範模式雖與我國類似，但於營利目的的加重規範，日本法係

僅規定最低刑度，保留了一定程度寬廣的法定刑，以資應
對販賣毒品各種不同的個案不法態樣，日本法的規範方
式一方面凸顯了法律規定法定刑之嚴厲與毫無彈性，另方
面其設定最低處罰刑度以上的刑罰幅度，則與貴院解
釋就犯罪情節輕微者劃定合憲法定刑下限之審查方式
一致。

四、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檢驗

(一)如前所述，法律規定之法定刑於體系比較後，已可認顯
然嚴重偏高，此時即應進一步檢驗嚴刑峻罰是否給予法
院適當裁量空間，倘可認完全剝奪，幾可認是違憲，反
之，若保留個案衡平機制，即可大幅緩解情法失平之違憲
疑慮（釋字第267號、第471號、第528號、第571號、第
641號解釋參照）。可惜的是，原確定判決無論從聲
請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行為人與
被害人平日關係等各方面，均可認聲請人之犯罪情狀顯然
輕微，法律規定已無法使聲請人於法定刑範圍內為符合
罪刑相當原則之量刑。固然，法官可再依刑法第59條規
定，認情輕法重而酌減聲請人刑度，惟因法律規定之法

定刑起點實在過高，違背相對均衡檢驗及絕對均衡檢驗，致法院欲酌減聲請人刑度，其最低刑度亦係有期徒刑15年以上，相較於被害個數單一又未減刑之殺人案件所處有期徒刑10年以上15年以下之宣告刑，前者已減刑的聲請人竟後者未減刑的殺人被告獲判較重之宣告刑，不論採何種觀點，均足令社會大眾之道德情感難以接受，進而對前者心生憐憫，動搖社會對刑罰正義之一般信念，法院又無法衡平前者之情法失平，被留罪責與處罰顯不相當、不相對應之遺憾。

(二)立法者為鼓勵毒品下游具體供出上予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故訂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使販毒者於供出毒品來源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得以減輕或免除其刑；又為鼓勵被告悔過，節省司法資源，故規定同法第2項，於販毒者偵審自白時，得減輕其刑。惟被告得否知悉其毒品來源何人？並得否及時提供予偵查機關據以查獲，與毒品交易歷程及檢調偵辦進度等外在因素至為相關，不能獲致上述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之處斷刑，顯非可歸責被告。又被告否認犯行亦可能係出於既

憶、認知之誠實錯誤，而為其防禦權之正當行使，可否謂不自白者均無悔改之意，亦實有疑問。再者，上述減刑規定係出於被告犯罪態度之考量，屬被告犯罪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與違犯行情狀事由尚有不同，雖被告犯罪情狀並非顯堪憫恕，亦得依上述規定減輕其刑，並得以遞減之（刑法第70條參照）。是上述減刑規定自非法究得以斟酌個案犯罪情節輕微與否，而據以裁量減刑之法律依據。

五、綜上所陳，原確定判決認王清萱向陳五豐電話約定購買毒品海洛因1仟元，陳五豐指不聲請人代為交付，並收取1仟元，然其毒品數量不夠王清萱施用1次，且聲請人別後再為交付（或代為）毒品海洛因予王清萱或他人之行為，屬零星交易之型態，其犯罪情節及聲請人責任均屬輕微，顯可憫恕，惟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聲請人刑度後，原確定判決仍量處聲請人有期徒刑15年2月，可知法律規定之法定刑僅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實無法忠實反應寬泛的販賣海洛因之犯罪型態及其情節，立法事實過於自我設限，其崇尚嚴刑峻罰卻無力實際解決毒害問題，徒增社會不公之印記，有損國民之

道德情感，撼動人民對刑罰正義與刑事司法之信賴，
無法通過相對均衡檢驗與絕對均衡檢驗之罪刑法定
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檢驗，案爭規定對情節輕微者，
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對人民受
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權之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
當原則，有違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謹以以上補充理由，請 鈞長一併附卷審查。

謹 狀

憲法法庭

公鑒

證據名稱

及件數

中華民國 112 年 01 月 17 日

具狀人 劉雲鵬

簽名蓋章

撰狀人 劉雲鵬

簽名蓋章